

原来还有“大河”三部曲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知道李劫人的名字。那时，我已经读过现代文学史上好几部“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了，譬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但我即使在读过李劫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后，还不知道其实这是“大河”三部曲的第一部，之后还有《暴风雨前》和《大波》。虽说这是我的孤陋寡闻，但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确鲜有对李劫人及其“大河”三部曲的专章详述——换句话说，李劫人及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和价值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

我在读《死水微澜》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异样的感受，那便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郭沫若的《幻变》有一种沉滞，那么《死水微澜》显得有点飘逸；如果说巴金的《家》结构稳重，那么《死水微澜》有点兴致所至；如果说郭沫若的《炼狱》有贴切的现下感，那么《死水微澜》具有丰厚的历史感。而我觉得这种不同更多地贯穿于李劫人作品中有一种无法言说甚至不可理喻的“洋气”，他写的完全是充满地域色彩的四川故事，但是，巴蜀意味的字里行间却总有西风穿行，有着别样的精致和完美。中国传统小说向来讲究故事的罗织和严谨，可《死水微澜》跳出中国传统小说重情节、重故事的框架，自由而肆意，更加注重细节，于细节中刻画人物，展现时代气氛和风土人情，颇有后来的“先锋派”、“新小说”的特质。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李劫人是最早一批赴法国留学的中国作家，很早就开始了法国文学的研究和译介，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中译本便是他翻译的，译名为《丹波达利》，中华书局1925年出版。当然，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深受福楼拜、左拉、都德、马格利特、莫泊桑、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影响。其实，《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更准确的说法不是“三部曲”，而是“大河小说”，而“大河小说”恰恰是19世纪中期以来法国长篇小说的重要体制，由巴尔扎克率先实践，后为众多法国作家所钟爱。“大河小说”的特点是多卷本、篇幅大、容量广、背景广阔、宏大叙事，正如滔滔大河，一泻千里。有评论家认为，李劫人的这三部长篇小说在结构上更多地借鉴了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看来，郭沫若称李劫人为“中国左拉之侍婢”也是名副其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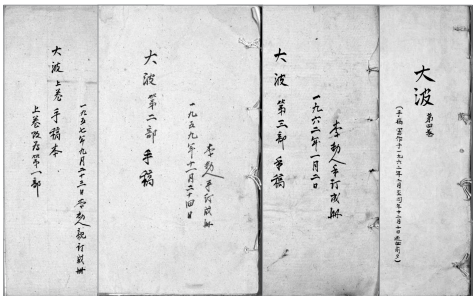
我是在间隔几年后才读到《暴风雨前》和《大波》的，读完之后，强烈地意识到作为文学大师的李劫人的存在，也强烈地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问世的茅盾的《子夜》(1933年)、巴金的《雾》(1933年)、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年)、李劫人的《死水微澜》(1936年)等，它们以各自卓越的艺术风格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而倘若其中没有自成一家、影响深远的《死水微澜》，那是构不成这种成熟的完整性的。李劫人对中国历史小说传统形式作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以崭新的结构和独特的叙述方式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李劫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仍时常缺席或错位。

《大波》竟有两个版本

《大波》是“大河”三部曲中分量最重的一部长篇小说，如同作品题目所标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终至导向《大波》，这是一条风起云涌、浩大绵长的线索，可见作家之用心和雄心。“大河”三部曲囊括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社会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年间的人际悲欢、思潮演进和政治风云，而《大波》则是



李劫人



《大波》重写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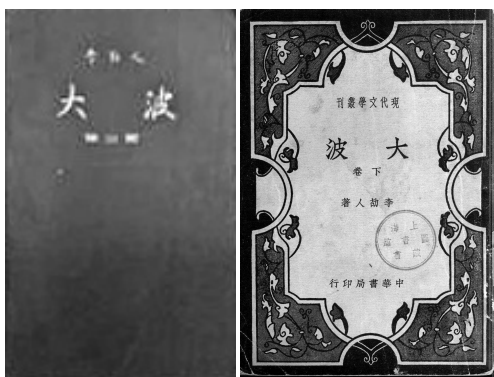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上惟一全景式正面描写辛亥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长篇小说。《大波》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人物众多、头绪纷繁，这当然可以理解，只是相比较《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我觉得它在勾勒历史线索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过于追求详尽，以致于叙述繁冗，造成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所弱化。有意思的是，在我有些疲倦地读完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后，忽然听闻我所读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李劫人重新写过的“新版《大波》”，而非30年代的“老版《大波》”。讶异之余，我找来老版《大波》重新开卷，居然找回了原先《死水微澜》的阅读感觉。原来，老版《大波》一样地既好读又耐读，一以贯之地恰当处理了真实历史与演绎故事、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的关系，将历史风云透过对社会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加以表现和传达，并积极生动而出色地塑造了黄太太、蔡大嫂、伍大嫂等个性鲜明、秉性泼辣的女性形象，富于人性深度的描写与刻画令人击节赞叹。这么好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要重写呢？这真让我莫名惊讶。

说起来，重写《大波》是李劫人自己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是自觉要求，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思想改造，而在1950年7月被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的李劫人，对于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因此尤为努力，积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真心追随人民群众。作为作家，他希望能以自己的新认识、新观念重新审视前时的创作，并有机会重写《以赎前愆》。赶上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步伐。而客观方面，1950年，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老版《大波》，但后来却不明原因地中止了。1954年5月，该社致函李劫人，称改写后再再再版。李劫人不仅决定另起炉灶重写《大波》，甚至还决定将整个三部曲都重新修改。

修改工作从当年11月开始，前两部进行得还算比较顺利，但到《大波》时，却迟滞起来，屡改屡弃。李劫人在《关于重写〈大波〉》一文中自述：“我从一九五六年起，便开始，确实第四次从头写了起来。虽然不能作到一气呵成，仍不免时作时辍，到底得了各方

走近我自己的李劫人

□简平



《大波》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四卷)

《大波》1937年版(三卷)

面不少帮助，和社会督促，使我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勉强把《大波》上卷写完了。”在该文中，李劫人还说道：“问题一定很多，说要‘以赎前愆’，恐怕未必！”从中，我们多少可以读出一些他的忧虑。事实上，新版《大波》第一部出版后，李劫人就听到了朋友们的批评：“看完《大波》上卷，酷似看了一出编排得不太好的大戏。但见人物满台，进进出出，看不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甚至完场了，也没看见一点缓歌慢舞、令人悠然神往的片段。”也有人批评：“不是戏，倒像是辛亥革命四川革命的一本记录本末。人物既缺乏血肉生气，而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形也反映得不够充分。”还有的人则说：“小说倒是小说，只是散漫得很，结构得不好。”对于这样的批评，李劫人是虚心若谷地接受的，而且还亲自记录了下來。不过，来自高层的意见则另当别论了。

据钟思远在《《大波》的重写与李劫人的“二次革命”》一文中记载，1959年初，张天翼受“组织”之托，就《大波》的创作倾向问题与李劫人谈话，指出《大波》在处理历史事件方面，尚有不明确的地方，如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评价。在1959年第二期中国作协组联会的《情况汇报》中，还记录了两人的一次谈话，张天翼就李劫人在作品中如何表现劳动人民的力量，提出了意见。但是，李劫人对高层批评的反应却含糊无力，以致同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约他写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他回信拒绝了，甚至表示：“不但目前不可能写，即今后永远也不可能。”

我一直感觉着，《大波》的重写是多么地悲壮。与其说，越到后来李劫人越是感到过去的思想观念与写作方式已经不适合现今的革命要求，不如说，他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按照革命化、英雄化标准，那已无法理智地掌控自己小说中的任何人物。《大波》4次重写，比老版增加了40余万字，修正了老版中对革命者身份的丑化描写，青年楚用也摆脱了与其表姨黄太太的不伦情感，走到了革命大潮的前头，可见李劫人自己所说“用了极大气力”，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却时常感叹“深深感到了困难”。李劫人在1962年10月27日给一位央求他代购新版《大波》的四川泸州读者程远礼的回函中说：由于“印数太少，不敷分配。这不怪出版社和发行部门，实由于我的写作写得不好，更其是对于当前读者，不是起到教育作用的缘故”。我感受到李劫人隐于文字后面的

痛苦、不安与反思，而这内心的种种，恰恰印证了他对于文学的坚守。

今年的12月12日，李劫人在四川省文联听完报告，回家小憩后，又开始伏案写作。到夜半，写完《大波》第四章第五节，旋即哮喘发作，家人将其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医生诊断为高血压、心脏病。12月24日夜，李劫人与世长辞，享年72岁。在他摊开的稿笺上，最后一个字是“六”，也即《大波》的第四章第六节。李劫人终究没能重新写完《大波》，让人唏嘘慨叹。

以“这一种”方式向大师致敬

今天，李劫人已被“重新发现”，而他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低估的地位也已经正在得到重新确立，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件幸事，因为我们除去羁绊，看到了前方如山一般高耸屹立的坚守文学本位和文学本质的一位大师。这样的幸事当然不仅仅属于文学，也属于这个民族，因而我们应该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李劫人，知道他写下的不朽名著“大河”三部曲。于是，我们选择了最具大众传播效应的电视剧，希冀以此推荐李劫人这位作家及其作品，也希冀以“这一种”方式向大师致敬。

事实上，当我推进电视剧《大波》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创作，还会像当年的李劫人重写《大波》那样陷于困难，比如对英雄主义、对历史判断的纠结，这使我在另一个层面上得以更加理解李劫人。此外，我很尴尬地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作家，我希望所有影视剧的改编都能坚贞不渝地忠实于原著；但是，作为制片人，我需要遵从电视剧这门艺术自身的创作规律。我最后选择打出的字幕是：“本剧取材于李劫人长篇小说《暴风雨前》和《大波》”，这是比较准确也比较稳妥的。我不想掩饰因取舍而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与不安，求教于一位老作家，老人鼓励我说：“你们要大胆地进行艺术再创作，不要受原著太多的限制，根据电视剧的艺术规律办事。”我想，如果我们的电视剧能够因此激发起观众的兴趣，转而阅读李劫人的小说原著，那也算是我们制作这部电视剧的初衷了。用电视剧《大波》总策划陈梁的话说，我们要制作一部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经典电视剧，从而让观众通过电视剧这座桥梁回归经典小说。

我想起我在《李劫人全集》第八卷中读到的李劫人1957年时写得多篇批判流沙河的名作《草木篇》的文章，从一开始的认为有错但又觉得无需小题大做，到“我已走到泥坑的边缘上了”，再到“我坚决要爬出泥坑！转变我的立场！”那语调明显地一篇比一篇高，但其中的无奈和苦涩也是很清晰的。事实上，《大波》的重写正是在这种政治斗争的高压下进行的，其压抑无疑加重了李劫人写作中的痛苦。而据李劫人的档案资料，就在他一遍遍地尝试力图体现革命性、时代性的当口，“组织”对他的政治鉴定是：“总的看来，李在整风‘反右’后，没有接受教训，对于党的领导仍内心不服，对党的方针政策一贯抵触不满……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嗚呼嗚呼，我看看如此“鉴定”，体味着李劫人的痛苦，心里惟有希望这样的悲切不会再有，不再以某种场域中的空间关系和权力关系定论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不再给文学强加超乎文学本身的任何其他因素。

视听时代，电视给人带来了快乐，但享受这快乐也必须付出相应的不那么快乐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不得不接受各类广告的狂轰滥炸，广告中最难以忍受的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酒是琼浆玉液，奶是天下无双，景区是人间仙境，保健品能包你长命百岁……且不论那些产品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抑或有可能根本就是一种心理催眠，甚至有可能谋财害命，单是那种或深沉、或亢亢、或庄严、或轻松、或雄浑、或娇媚、或语重心长、或天真无邪……总之世界上所有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一而再再而三没完没了地重复，其实也就跟噪音没有区别了。谎言重复一千遍有可能成为真理，也有可能成为噪音。当然，不愿意听可以换位，可以走开，可以关闭，问题是许多人不但听，而且还相信，而且还把它当成了生活指南，当作了追逐的目标，结果，往往让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常态，失去了本来实实在在的意义。

扯上美国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有点远，还是说身边的例子吧：我有个亲戚，他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老父老母在儿女成人一个先先后后离家后，坚持单住。退了休，既不肯拖累子女，也不肯花钱请人照顾，在闹市住着，却几乎与世隔绝，别说跳广场舞、听保健讲座了，除了买菜、油盐酱醋之类，极少下楼。家里也没有电视、电脑之类，家具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旧物。一日三餐，扫地抹灰，洗衣浆衫，全都自己动手。闲空时就读书或品茶，如此直到成为百年人瑞。之前我们很好奇，专门去打听养生秘笈，二老笑说：要是真有那么管事的秘笈，那世上万寿无疆的人就太多了。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该活时就活着，该死时就死去，一切听其自然就好了。

如果说两位老人的人生太过平淡，除了长寿别无价值，那么另一个例子我想多少能对我们有些启发。去年我写八大山人传，在资料中看到，八大山人现存作品中，有他61岁时为有金兰之好的几位朋友画的《题清供图》。赏析说明画于上元节。

画上有题诗：“春酒提携雨雪时，瓶瓶钵钵尽施为。还思竹里还玉髻，画插兰金两道眉。”上元节的雨雪中，三二好友提携冬酿春熟的酒去郊游。上元是春节的最后一天，也叫“大年”，是整个春节从初一至十五闹元宵、闹花灯、打龙灯，最热闹的高潮。而这天却又一般会下雨。仍有出游，就是想回避那些喧闹。郊游中大家都狂欢“施为”，尽情饮酒，以致有些失态，“瓶瓶钵钵”相互碰撞得乱响。一行来到一个竹林中的老宅，竹叶的丫杈让画家想到少年时的玉髻，又想到画兰、画竹时的涂鸦趣事，那少年画兰的左一撇、右一撇，就像“两道眉”的兰叶。当年的稚拙天真全部浮现了眼前。

于是八大山人画上的两支兰叶，也是左右两撇，如初之撇，一低一昂，如舞如蹈，充满动势，是八大山人的代表作之一。

八大山人当时结识的是一帮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并不缺闲空的风雅之士，过年的最高潮，他们并没有非名山大川不去，也没有去凑热闹非凑不可的热闹，却同样过得有滋有味。他的一生，除了20岁之前的已经落魄的王府生活，几乎都在社会底层颠沛流离，但他依然活到了耄耋之年，依然成为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的中国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并以太空科文座命名的伟大艺术家。

这让我懂得，朴实是最好的状态；最朴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

大白话

过朴实的生活

□陈世旭

在我还是儿童的时候，就曾莫名其妙地被老爸送进了苏联人创办的红十字幼儿园，被迫在那里吃东欧式的西餐。坦率地说，我对西餐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研究的。我早期的作品也经常出现这种东西。特别是我的长篇小说《马尸的冬雨》，它从头到尾全都是关于俄国侨民的生存故事。总之，那一段别致的生活像风一样吹进了我的生命，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拨动着我的心弦，并蓄存于我的整个经历当中，成为个人的一份私藏的精神资源。

可以大胆一点儿地说，这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记忆，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阅读、欣赏和写作的走向。在这里，恳请读者以宽容之心容我吹嘘一下自己（哈尼族作家存文学老弟说：写这些不是宣传自己，而是张扬我生存的土地），在我出版的近40本作品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都充满着对渗透着可爱的俄罗斯色彩。这其中包括建筑方面的随笔集，像《仰望殿堂》《远东背影》等。这也给众多的后来者提供了参考与撷取的文本。我因此倍感甜蜜。

在俄侨渐次回国或离去之后的日子里，这种别样的情感并没有因此终结，它如同一个永恒的话剧舞台，虽然那些俄国人离开了这个舞台，但布景、道具和风格还在。于是，自觉不自觉地，由当地的中国人，即哈尔滨人，继续地演绎、发展、丰富着这一人间喜剧。根据我的了解，我这一代和我的父辈们，多年以来，一直喜欢苏俄的文学、电影、艺术、音乐、饮食和服装。这就是一种情感延续的文化过程。就这样，一种持续着对苏俄的现当代文学、苏俄电影、苏俄艺术的深情关注，从中体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进步与变化，包括局限。的确，文学从来是一个国家最为鲜活也最为深刻的体现，更是滋养我个人进行创作的一个重要来源。

北纬45度线

□阿成

在我看来，阅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欣赏式阅读，另一种是情感式阅读。其中情感式阅读之根，则源自于读者特有的情感经历，而一个人的情感经历，一定与他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生存环境决定一个人的情感取向。通俗地说，故乡是乡党们情感中最温厚的土壤，它不仅牢牢地掌控了乡亲们审美方式，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即便是身处都市的农民，不管他怎样沉迷于爱恨交加的城市生活，也一定会在雨后天晴地里的庄稼。而普通的城里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会想着出门时带上那把伞。顶多，走在雨帘斜落的街道上会产生一点罗曼蒂克式的诗情而已。换句话说，城市人和农村人要想做到彻底的无障碍交流，那就只有向时间祈祷。好了，现在我来聊聊我的城市——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到现在，城市的年龄也不过100多岁。比某些仍然健在的百多岁老人还年轻。若要比起南京和西安那样的古老城市，更不知道要晚上多少辈。总之，哈尔滨，应该是近代城市史上的一个奇迹。毋庸讳言，是中东铁路的辅建催生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诞生。在这座城市的开埠之初，有趣的模样和亢奋的状态，有点像一个人一个中外的合资的大项目，而参与项目中的外国人几乎占去了全市民的二分之一还要多一点。特别要提示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俄国人。这些形形色色的俄国侨民，真的是五行八作，各种人才都有。我虽然不清楚他们这些人的内心在想些什么，但不可否认，这些外国侨民是这座城市的设计、建设大军当中的一支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具体地说，他们的到来，不仅仅使城市的街头充满了厚实的皮鞋油味、刺鼻的香水味，而且更使使得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饮食、文化、艺术、体育，包括宗教、时装，甚至市井上流传的玄疑传说等等，都蒙上

了一层华丽的欧陆色彩。比如，当年的那些俄国侨民在思乡情感的驱动之下，在哈尔滨修建了30多座教堂。尼古拉教堂、圣母报喜教堂、索菲亚教堂等等。这样一来，哈尔滨也因此得了一个“教堂之国”的称号。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不仅让那些流亡异国他乡的俄国侨民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而且，这种钟声荡当地中国人的心灵里，也引起了一种圣洁的享受和美好的记忆。再如，哈尔滨人之所以喜欢喝酒，而且在全国，哈尔滨的啤酒销售量一直名列前茅。其重要的诱因，就与这座城市生产啤酒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哈尔滨最早的几家有名的啤酒厂，像乌鲁夫斯基啤酒厂、梭尼奴啤酒厂和维夫列啤酒厂，多是俄国人或波兰人开办的。哈尔滨的啤酒以其品质优良，味道甘醇，在全国众多的啤酒爱好者当中享有极佳的口碑。因此，有人称哈尔滨是一座“啤酒之城”。还有，在1908年的4月，紫丁香刚刚绽放，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就将俄国阿穆尔铁路第二营管弦乐团调入哈尔滨，成立了“哈尔滨(中)东清铁路管理局交响乐团”。有文化的人称它是“远东第一交响乐团”。从此，那里成了众多流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艺术家施展才华的艺术圣殿，并上演了多部世界名剧，像《天鹅湖》《黑桃皇后》《卡门》《浮士德》《费加罗的婚礼》等等。因此，一个法国记者曾撰文称，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当然，更多的人称哈尔滨是“远东的莫斯科”和“东方的巴黎”。除此之

外，苏俄侨民们还组织了“丘拉耶夫卡”诗社。诗社的诗人们每个月都举行一次对外公开的晚会，称“在绿树下会面”。出席这个晚会的都是俄侨，有诗人、歌手、音乐人等等。他们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小说、散文，像《艾蕾与太阳》《走在冬天的草地上》《善良的养蜂人》《翅膀》《沙岸的河岸》《大地的歌》《上帝拯救俄罗斯》等等，文化气氛相当浓厚。在我逃学闲逛的日子里，在街上常能看见路边长椅上读书的苏俄侨民。那些将书斜插在大衣领内匆匆地走在街上的俄国青年，则是再普通不过的寻常风景了。有位俄罗斯女作家说：“读书是一种心理需求，是以心灵的力量战胜贫困的生活”。那么，流亡到哈尔滨的俄侨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一定是为了排遣思乡之情吧。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古怪的城市环境中生活、成长的。换言之，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让我与一些俄侨有了比较广泛的接触。记得还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就在现在的友谊宫和哈尔滨音乐厅看过俄文版的苏联电影《前哨》和《培养勇敢的精神》。后来接触的就更多了，举例如说，像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复活》，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猎人笔记》，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蒙塔托夫和普希金的诗，电影《两个人的火车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等。更早的还有《风暴》《难忘的一九一九》等等，以及那些表现苏联卫国战争年代的众多影片，甚至还有门



星河